

中国国民党在 台湾40年纪事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40年纪事

李松林 等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350×1168毫米 32开本 16.5印张 400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1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7501—10500

ISBN 7-5065-1299-8/K·106

定 价：7.90元

社编号04—0047

(内部发行)

概 述

40年前，中华大地发生大裂变，大陆易帜，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被迫于1949年12月8日播迁台湾。同月10日，蒋介石父子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向台湾飞去。“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几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四海茫茫的台湾孤岛。从此开始了偏安台湾的时期。岁月不居，世道沧桑。40年来，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台湾岛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及两岸关系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日之台湾，早已不是40年前的台湾；今日之中国国民党，也不是40年前的中国国民党。对于中国国民党在台湾40年的变化，我们亟有必要作一系统、宏观的回顾与研究，以加深对台湾社会的进一步了解，促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

纵观中国国民党到台湾后40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中国国民党“卧薪尝胆”，企图奠定“反攻大陆”基础阶段；图谋“建设台湾”，稳步发展，进行“反

共复国阶段”；“革新保台”，偏安求存阶段和在台湾统治趋向动荡阶段。下面分别扼要述之。

从1949年底至1959年，是国民党“卧薪尝胆”，奠定“反攻大陆”基础的阶段。此一阶段，国民党在台湾政局经历了从混乱到稳定的演变。

众所周知，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整个台湾孤岛人心惶惶，社会动荡，到处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当时身为国民党要员的张道藩描绘自己从穗至台湾后的心情说：我对“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真想“自杀”。就连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也深感国民党“已彻底失败而绝望”。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自我放逐，逃亡海外。军事上是一团糟，沾染上北洋军阀所有毛病的国民党军队，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政治、军事攻势，已成惊弓之鸟。虚张声势有余，抵抗不足。且万里海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供给困难，海防松弛是台湾防务的一个致命弱点。经济上，亦令蒋介石担忧。贫乏的台湾自然资源，压上了国民党带来的200万人口，其经济力难以承受。加之台湾军队骤增，军费只能靠印发钞票来应付，故大陆通货膨胀又在台湾重演。外交方面，台湾更是孤立无援。世界一般舆论都认为国民党集团在台湾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就连国民党最主要的外交盟友美国也等待“尘埃落定”，暂取“观望政策”。对此，《蒋总统的一生》的作者吴一舟哀叹：“所有外国使馆人员及侨民均已离开台湾，认为台湾沦陷的命运，已无可挽救。”

就全盘形势而言，国民党退台初期的台湾政局，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并不过分。如何将混乱的危局稳定下来，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当务之急。蒋介石父子败退台湾后，隐居在台中

日月潭的涵碧楼，父子二人除了“兴叹英雄的末路悲怀”之余，偶尔也反省大陆失败的原因。痛定思痛，蒋介石下决心，“卧薪尝胆”，完成“反攻大陆”的准备。为了稳定台湾政局，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重登大宝。蒋介石的权力欲是极强的，既使在1949年初引退之后，他也从未放过权。但他总感觉“名不正，言不顺”，千方百计地想取李（宗仁）而代之。当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复职”活动亦在进行之中。由于李宗仁既不交权，又不肯妥协，“复职”活动暂时搁浅。李宗仁赴美“就医”后，蒋介石异常愤怒。到台湾后，他立即指使“国大代表”“劝进”。“国大代表”上书曰：“国危至此，中枢不可一日无主”，故请总裁复“总统”职。其后，蒋介石又指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向李宗仁发出最后通牒，限李宗仁于三日内返台，否则便放弃其“总统”职权。由于李宗仁未能遵守蒋介石的时间表，国民党中常会决议请蒋介石早日复“总统”职。至此，蒋介石认为时机成熟，再无推托之必要，旋于1950年3月1日重登大宝。蒋介石发表《复职文告》称：“复职”完全是“惟国民公意是从”，担此重任是为“光复大陆，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蒋介石的做法遭到大洋彼岸李宗仁的抨击。李宗仁称蒋介石“复职”是“违法”、“荒谬”。但蒋介石并不在乎。他复职后便更换李宗仁任内的人事安排。他首先让自己的心腹陈诚取代阎锡山组阁，使台湾成为清一色的蒋家天下；其后安排长子蒋经国掌管政治部，并负责情报部门及对大陆活动的指挥派遣，使其开始控制军特部门，为其进一步升迁做准备。

对于蒋介石“复职”，李宗仁抨击一针见血。作家江南也在《蒋经国传》中称其“明知其不能也要为”。这是因为蒋介石性格倔强，不战至最后一人，决不轻言牺牲。此种评价也颇为深刻。同时亦应看到，在台湾一片混乱、群龙无首的情形下，蒋介石

石的“复职”，在客观上对稳定台湾政局有一定作用。

第二，改造国民党。蒋介石“复职”后最急迫的任务便是稳定国民党内部。7月26日，蒋介石宣布改造、重建国民党方案，并称：“如不彻底改造，将有亡党危机。”蒋介石何以这样急不可耐地“改造”、“重建”国民党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蒋介石认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主要是党的失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这次大陆反共军事悲惨的失败……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戡乱失败的最后一步，还是在党的失败”。

其二，国民党退台后，虽然组织涣散，但派系争斗犹存。蒋介石为使台湾成为真正的清一色的蒋家天下，就必须对国民党来一番改造，清除反对派。

其三，寻找替罪羔羊。国民党在大陆的惨败，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纷纷起来追究失败的责任。蒋介石说大陆失败首先是党的失败，自然主要责任应由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来负，但是无人敢指责蒋介石。蒋介石为开脱责任，企图将大陆失败的责任推到主管党务的陈果夫、陈立夫的头上。

基于上述三点原因，蒋介石遂下决心改造国民党。1950年8月，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正式成立。其后，改造、重建国民党的运动在岛内全面展开。1952年10月召开国民党七大，宣布改造完成。

透视国民党改造运动，可以看到，蒋介石的最初愿望基本得以实现。

首先，将反对派统统挤出决策圈。1950年8月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改造期间代行国民党中执会和中监会执权。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均是其心腹，如陈诚、袁守谦、谷正纲、张其昀等。大陆时期政界、军界显要，如阎锡山、何应钦、翁文灏、孙科、白崇禧等没有一个进入决策圈内，而只获得一些有名无实的头衔。经此安排，国民党内原有的

孔宋系、政学系、CC系等派系，统统被挤出决策圈。

其次，为蒋经国再度升迁铺平道路。传位于子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大陆时期，由于派系复杂，蒋经国羽毛未丰，若将其摆在决策圈内尚须排除许多阻力。如今亡命孤岛，又经过大动乱的淘汰清洗，再无需顾忌内部的倾轧与平衡。因此，蒋介石便把蒋经国安排进16人的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中。在国民党七届一中全会上，蒋经国又被推为国民党中常委。从此，蒋经国又开始控制党务部门，真正抓到了党、军、特的实权，为日后升迁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再次，整顿了各级组织机构。在重建各级党部和组织时，注意吸收新党员。新党员的标准，除了坚决反共之外，还须“以身作则”。由此说明，国民党开始注意汲取大陆失败的教训。与此同时，蒋介石加强对军队的进一步控制，在军队中开始实行军事长官轮换制，规定军事长官任期三年，期满轮换。此一制度，使国民党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高级将领不能在军队里从容培植个人势力。蒋经国还通过中央党部，对中统、军统特务机构进行了整顿和改组，加强了对特务机构的直接控制。

对于国民党改造运动，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种观点认为：“这次改造意义重大，不仅重点在整顿革命组织，恢复革命精神，尤其是确定了本党‘革命民主政党’的属性……是党的新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改造运动，只是蒋氏父子‘篡党’的一种手段，‘改造’下来，乃是使国民党造成‘蒋家党’。”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有偏激之处。凭心而论，由于国民党已病入膏肓，加之蒋介石怀有私心，国民党不可能得到“彻底改造”。但亦应看到，此次改造，的确整顿了国民党各级组织，完成了国民党各级组织的整建与上层权力的再分配，对于国民党退台初期的政局混乱，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当然，国民党改造的确加强了蒋介石对国民党的进一步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蒋经国接班奠定了基础。

第三，集兵保台。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最感头痛的问题是海防问题。海峡对岸，中共集结重兵，时刻准备解放台湾。而国民党军沿海防务废弛，守军兵力不足，装备训练欠佳，群情惶惑不安，战斗意志低落。美国人曾说，台湾将在1950年“陷落”，并非无稽之谈。如何防止台湾“陷落”呢？国民党中委会曾做过认真研究。蒋介石认为，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兵力过于分散。于是，决定撤退海南岛、舟山群岛等岛屿的兵力，集中保台。

撤退之前，国民党军许多重要将领深恐放弃诸岛会引起更大的人心不稳，纷纷表示反对。就连蒋经国最初也表示了反对意见。就当时实际情形而论，国民党若不及时撤退海南岛、舟山群岛兵力，则必将为人民解放军所歼灭。但诸岛兵力撤退台湾后，并未使台湾政局得以稳定，反而加剧了台湾社会的动荡。在此情形下，蒋介石被迫于1950年5月16日发表《军人魂》的演讲，重弹“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同日，蒋介石又发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宣称放弃两岛是为“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基地”，光复大陆。其后，蒋经国发表了《由定海到台湾》的公开信，宣称此次撤退是一“惊人的举动”，不是争“一时的成败利钝”，而是争“国家千秋万世的大业”。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指使夫人宋美龄前往基隆，慰问撤退来台的部队。

对此如何评价？吴一舟在《蒋总统的一生》中称，“今日台湾有如此的安定，都是从蒋总统这个军事上英明的决断为起点”。《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则反唇相讥：“失去海南、舟山，相当于割断台澎的手足，毛泽东的下一步，将是渡海攻台，90英里的台湾海峡，假使荷兰人300年前抵抗不了郑成功的海师，国军凭什么能确保呢？”

正当台湾国民党当局喧嚣“保卫大台湾”，惶惶不可终日之际，“战争的台风”并未吹临危殆中的台湾，却于6月25日在朝鲜半岛登陆。朝鲜战争爆发使美国一夜之间改变了对台政策，年

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也将主要精力用于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从而使国民党偏安台湾孤岛的局势得以维持。

第四，开展“革命实践运动”。此一运动是在蒋介石部署“保卫大台湾”的同时展开的。蒋介石称：之所以开展“革命实践运动”，是因为大陆失败“最主要的致命伤”，是“一般干部普遍犯了虚伪的毛病，相习于虚浮夸大，而不能实事求是。这种风气流行的结果，使得部队、机关和学校，一切办事、命令和报告，都是互相欺骗、互相蒙蔽，而没有几件事是完全实在的，可以相信的。这一恶习颓风，如果不彻底革除，真是要使我们亡国灭种”。“当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开展实践运动”。要“洗心革面，从头做起”，以完成“反攻大陆”的神圣使命。

为了配合“革命实践运动”的开展，蒋介石在台北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自兼主任。同时，还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军官训练团”，为“革命实践运动”培养干部。

从蒋介石的言论及行动看，他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反省还是比较深刻的，虽然没有认识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但对其大陆失败所犯错误的表现总算看到了。当时，蒋介石决心很大，很想认真接受教训，完成“反攻大陆”准备。然而，蒋介石的“实践说”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是十年“剿共”时期“力行哲学”的翻版而已。当年，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并未能改变国民党军队“沉滞不进”，也未能完成“剿共”之业，反而被赶到台湾孤岛上来了。现又提倡“实践”，就能克服“虚浮不实”，实现“反攻大陆”之念吗？五年之后，蒋介石总结“革命实践运动”时，痛心地说：五年以来，“我虽不敢说大家根本没有去躬行实践，可是真正切己体察困知勉行的同志，那实在是不能多见”。由此可知，“革命实践运动”在表面上轰轰烈烈，实则宣传归宣传，行动归行动，收效甚微。

第五，进行“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国民党退台初期所实施的另一重要决策。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都未开展“土地改革”，为何一到台湾便大刀阔斧地进行呢？蒋介石自己宣称：我们目前进行的是“反共抗俄”战争，此一战争是为了坚持、实现三民主义而战。

“满清革命时期，我们乃是以民族主义为其重心；对军阀革命时期，则是以民权主义为其重心；在今日对共匪戡乱复兴的国民革命时期，乃是以民生主义为重心的革命”。实施民生主义的起点便是开展“土地改革”。很显然，蒋介石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一，国民党开展“土地改革”是为解决退台后的生机问题所被迫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台湾当时仍以农业经济为主，封建剥削制度在这个社会中仍占据着统治地位，租佃纠纷十分严重。国民党到达台湾后，此种纠纷有增无减。为了维持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就必须解决生机问题。而解决生机问题的关键，则是缓和农村阶级矛盾，提高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以促进台湾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稳定政局。其二，正如国民党的叛逆者孙家麒先生说：“因为地主全部都是台湾人，所以国民党可以大慷他人之慨，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毫无顾忌地认真推行。假如当时百甲以上的大地主，有三五个是属于皇亲贵戚之流，我想台湾的土改工作，能否顺利推行成功，恐怕连陈诚先生也不敢作肯定答复的。”

台湾“土地改革”分三个阶段，按孙中山所设计的模式进行。第一阶段为三七五减租。所谓三七五减租，就是限定佃农交租不得超过37.5%和保证佃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佃农的地租负担，缓和了租佃矛盾，但也照顾地主利益过多。第二阶段为公地放领。即将公地租给农民。共租给农民7万公顷土地（其中水田3.4万公顷，旱田3.7万公顷）。地价是土地作物年产量的2.5倍，分十年还清，年息四厘。受领公地的农民由于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农产品产量也随之增加。第三阶段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规定地主可保留中等水田三甲（一甲合0.97公顷）或旱田六甲，超过部分一律由当局征收，转放于现

耕农民受领。当局付给地主一部分工矿企业股票，一部分实物债券。地价计算办法与公地放领相同。再以相同价格将土地转租给农民。农民则以实物偿付地价。当时，共征收地主土地（包括公地）共21万公顷，约占耕地总数25%。由于“耕者有其田”政策的实施，使大量无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进一步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助于国民党当局乱中求稳。

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社会舆论颇多颂扬。有人将其说成是“造成亚洲屈指可数的繁荣的农村”。笔者也认为，就台湾“土地改革”的实际情况观之，此举成功之处，在于基本消灭了封建主义势力，使台湾农业迅速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并促进了台湾工业经济的恢复。同时，在农村建立了新的经济、政治结构，为台湾后来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台湾的“土地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地主的利益。陈诚曾公开声称：“三七五减租，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佃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际上也保护了地主”。“实行三七五减租，可避免共产主义的流血斗争，温和地调和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逐渐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土地改革”仅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地权，远没有做到平均地权。

在“土地改革”同时，国民党当局为了制止通货膨胀，消除金融危机，还在经济上采取币制改革政策。当此政策初见成效后，又在全岛实施高利率政策，进一步减轻了通货膨胀对市场的压力，同时利用吸收的大量游资扶持迫切需要发展的各个经济部门。加之“美援”适时到达，使将垂死的国民党政权犹如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使市场供需紧张状况趋向缓和，恶性通货膨胀得到初步控制，经济形势由动荡逐渐趋向稳定。其后国民党当局又根据国际环境制定了“以稳定经济为先”，“农工均衡发展”，实施“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十年努力，终于使台湾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为60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第六，修补反共思想体系。蒋介石在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

认为大陆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革命哲学作基础”，“徒有完美的主义，高尚的哲学而不能实践笃行”。1952年元旦，蒋介石提出开展“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其目的是“使台湾确成为三民主义政治设施的模范和雪耻复国的基地”。如何完成呢？蒋介石认为，主要靠“社会民众和主义思想的力量来支持”。因此，蒋介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加强“心理建设”。为加强心战，蒋介石还不断著书立说，其中《反共抗俄基本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和《苏俄在中国》被称为反共的“三大论著”。在这些著作中，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系统地攻击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把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纳入反共的轨道。在这种反共思想体系指导下，狂烈的反共宣传，一时遍及全岛。

第七，国民党当局对美国采取一边倒政策。国民党在大陆彻底崩溃之际，其最主要的外交盟友美国曾发表了白皮书，然后对国民党采取“袖手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公然出兵朝鲜，派兵占领台湾海峡。事实表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使美国改变了对国民党的“袖手政策”。同时也使处于外交绝境的国民党当局意外地获得了一张盖有杜鲁门印章的“人寿保险单”。国民党当局拼命抓住美国，使美国在对国民党当局“军援”的同时，还恢复了“经济援助”，当反共坚决的艾森豪威尔取代杜鲁门之后，台美关系又进入新的“蜜月”时期。由于艾森豪威尔一上台就对中国打“台湾牌”，不仅取消了杜鲁门关于台湾“中立化”的声明，“放蒋出笼”，而且接受了蒋介石提议台美双方签订一个“共同防御条约”的意见。此条约于1954年12月签订。艾森豪威尔“放蒋出笼”的政策，使蒋介石有恃无恐，大肆叫嚣“反攻大陆”。

上述七个方面是国民党当局为确保台湾安全，完成“反攻大陆”准备所采取的重要措施。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与国民党汲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使上述措施的确收到一定效果，政治局势

开始从混乱走向稳定，经济局势也有所好转。至于国民党当局宣传的完成了“反攻大陆”的准备，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二

由于台湾政局逐渐趋向稳定，进入60年代之后，国民党当局将全力投入经济建设，企图求得稳步发展。为此，台湾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在政治上，蒋介石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完成了传子部署。按“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连选连任只一次。如再连任，即属“违宪”。1954年，“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在台北召开，蒋介石已两度连任“总统”。1960年“国民大会”一届三次会议在台北召开时，蒋介石为避“违宪”之嫌，竟让“大法官会议”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非常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的限制。这样一改，蒋介石既不“违宪”，又可做终身“总统”，还为传位于子扫清障碍。

尽管当时台湾处于军事戒严时期，所有舆论工具均为蒋介石所把持，但仍有人对蒋介石的荒谬之举进行发难。《自由中国》杂志发行人、原老国民党员雷震多次发文反对蒋介石再度连任“总统”。但蒋介石不顾雷震等的反对，一意孤行。由于蒋介石未立即对雷震等采取行动，雷震等低估了蒋介石的决心，高估了美国人对台湾的影响力，开始调查选举情况，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的黑幕等。此举触怒了蒋介石。1960年9月4日，蒋介石下令以“煽动叛乱罪”之名逮捕雷震。同时逮捕《自由中国》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骏、会计刘子英三人。雷震案发后，台湾组党活动陷入沉寂，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声音被完全封闭了。

据雷震讲，他的被捕与他批评蒋经国有关。对于蒋经国在军队的做法，雷震甚是不满。对于蒋经国负责“救国团”工作更是

颇多指责。1957年后,《自由中国》刊载了“反攻无望”的社论,批评台湾当局死死抱住“反攻大陆”不放是“弊害横生”。故此,雷震、蒋介石冲突升级,终于演变至雷震下狱。

进入60年代之后,蒋介石深感接班问题迫在眉睫。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大召开时,蒋介石以“提拔新进”为名,暗示陈诚交权。陈诚以病体为由,坚辞“行政院长”职。于是,蒋介石让以“推事”著称的、没有班底的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严家淦组阁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时任“国防部长”的俞大维是个弹道专家,且又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是文人,书生气十足,极少过问部内事物,放手让蒋经国去做。两年之后,经俞大维推荐,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长”。从此,蒋经国兵权在握,名正言顺地成为台湾最高军事官员。

1965年3月5日,“副总统”陈诚病逝。于是,蒋经国接班的最后一个阻力自动消除。陈诚病逝后,蒋介石在“国民大会”一届五次会议上安排严家淦继任陈诚“副总统”遗缺。严家淦立即将“行政院副院长”一职交与蒋经国。当严家淦下届再度连任“副总统”后,蒋经国便正式接掌“行政院”。至此,蒋经国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成为真正的第二号人物。

“反攻大陆”是60年代台湾国民党当局一项重要任务。自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便念念不忘“反攻大陆”。1950年5月,蒋介石开出一张政治支票,即:一年准备,两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为了“反攻大陆”成功,台湾当局加紧训练偷袭大陆的游击队,不断派小股部队偷袭大陆沿海。1956年至1958年,海峡两岸不断发生炮战、空战、宣传战。由于“反攻大陆”始终不能兑现,蒋经国遂将“反攻大陆”口号改为“反共复国”。此调时高时低,但台湾国民党当局始终坚持不舍。

1962年前后,蒋介石借大陆发生严重困难,中苏关系恶化之机,再次叫嚣“反攻大陆”。同年11月,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

会，提出三大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反攻大陆”。与此同时，先后派出九股特务武装在大陆沿海登陆。但得到的却是北京发布全歼九股国民党特务武装的消息。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大在台北召开。会议重弹“反共复国”老调。蒋介石在会上宣称，“现一切反攻准备，即已接近就绪”，提请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发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之配合。1964年12月，蒋介石又在视察金门时，发起了“毋忘在莒”运动，企望田单复齐故事重演。然而，梦想归梦想，现实归现实，从1964年至1965年，台湾国民党当局派出的多股骚扰大陆沿海的部队无一返还。事实敲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迷梦。

在经济上，台湾国民党当局面临着新的问题：美援停止；内部市场饱和；代替进口工业受阻；失业严重；贸易出现逆差，财政出现赤字。面对这种形势，台湾国民党当局在50年代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采取了比较正确的经济发展策略：即以“发展加工出口经济为主”，以“发展劳力密集的外销工业为主”。主要措施是：

第一，实行财经改革，搞局部自由化，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1959年，拟定19项经济改革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平衡政府预算，鼓励私人储蓄与投资及扩大奖励出口等。

第二，改善投资环境，开办加工出口区，开始大量引进外资。1958年，实行外汇贸易改革，调整新台币汇率，放宽进口管制，将过去以“国内导向”为主的经济转变为“国外导向”为主，使产品在广大的世界市场找出路。为了吸引外人及华侨到台投资，先后在高雄等地设立工业区与加工出口区，并颁布《奖励投资条例》。1970年又设立“对外发展贸易协会”，协助发展对外贸易。

第三，实行外贸与内资一并鼓励，区内（指加工区）与区外（指工业区）齐头并进，引进与自筹双管齐下的多形式筹集资金和发展生产的政策。

实施上述措施的结果，使贸易余额开始转亏为盈，更加有利出口。出口工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整个工业的快速发展。因此，有人称60年代是台湾经济的“起飞”时期。

在外交上，台湾国民党当局仍谋求同美国等国保持盟友关系，以维持其在国际上的地位。60年代前后，中国政府为谋求同美国解决在台湾问题上的国际争端，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主动提出并积极争取举行了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由于台湾当局对谈判的干扰和美国坚持不放弃霸占台湾的政策，致使会谈18年130余次，均无结果。70年代初，在美国、日本及西欧等国的留学生掀起了保卫钓鱼岛运动，唤起台湾广大群众的民族意识与政治觉醒，他们开始关心国事，打破禁区，台湾政局为之一新。

三

从1972年到1980年，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联大驱蒋，日、美等国纷纷与中国建交，台湾逐步丧失“国际人格”，在“夹缝中求生存”。在此种情形下，蒋经国提出了“革新保台”的口号，推行“在台生根”，偏安求存的路线，采取了以下措施：

人事安排方面，实施“年轻化”、“本土化”政策。1972年“国民大会”一届五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名蒋经国为“行政院长”人选。国民党中常会奉令行事，通过了蒋介石提案。“立法院”也立即投票选举蒋经国为“行政院长”。蒋经国上台后，台湾政局立刻出现了“新气象”。“新气象”首先表现在内阁名单上。从名单观之，内阁成员年轻化了，平均年龄61.8岁，此种做法对于打破老人政治起了一定作用。蒋经国之所以一上台便一反过去老官员轮流坐庄的办法而启用新人，主要是由于上层官员老化现象十分严重。同时也有他为对抗元老派的因素在内。内阁成员“省籍菁英”比例大幅度提高。众所周知，在国民党退台后长